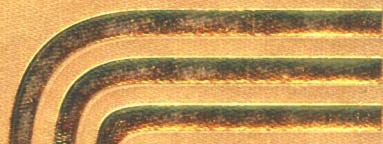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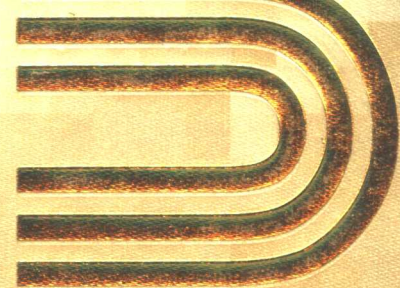


诺贝尔奖
讲演全集





NOBEL

诺贝尔奖讲演全集

经济学卷

II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贝尔奖讲演全集. 经济学卷Ⅰ / 《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编译委员会编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10

ISBN 7—211—04416—0

I. 诺… II. 诺… III. ①诺贝尔奖金—科学家—演讲—文集②化学—文集 IV. Z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8524 号

诺贝尔奖讲演全集

NUOBEIER JIANG JIANGYAN QUANJI

经济学卷Ⅰ

《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编译委员会编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22 印张 5 插页 529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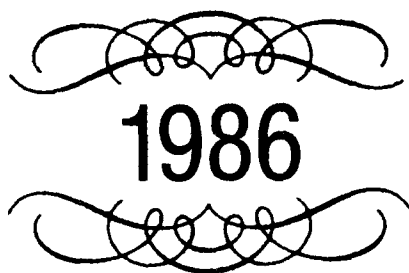
ISBN 7 · 211—04416—0
G · 2810 定价: 5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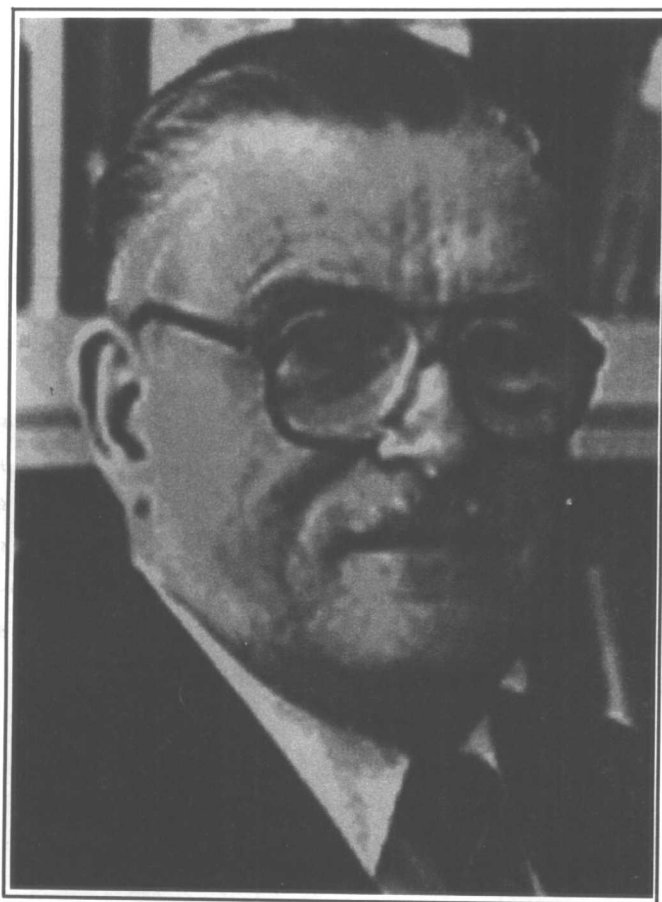
1986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1
1987	罗伯特·M·索洛	21
1988	莫里斯·阿莱	47
1989	特里格夫·哈维尔莫	73
1990	哈里·马科威茨 威廉·夏普 默顿·米勒	89
1991	罗纳德·H·科斯	153
1992	加利·S·贝克尔	171
1993	罗伯特·W·福格尔 道格拉斯·C·诺思	201
1994	约翰·海萨尼 约翰·纳什 莱因哈德·塞尔腾	255
1995	罗伯特·卢卡斯	351
1996	詹姆斯·米尔利斯 威廉·维克里	377
1997	罗伯特·默顿	

	迈伦·斯科尔斯	433
1998	阿玛蒂亚·森	515
1999	罗伯特·A·芒德尔	551
2000	詹姆斯·J·赫克曼	
	丹尼尔·L·麦克法登	581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因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
开拓性研究而获奖。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传 略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1919年10月2日生于田纳西州。

布坎南1940年获田纳西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1年在该校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6~1968年任弗吉尼亚大学托马斯·杰斐逊政治经济学中心查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主任。1969年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并创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至今仍在该校任经济学教授。此外,曾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代表作有《同意的计算》、《征税的权力》等。

颁奖词（瑞典皇家科学院斯托尔教授致词）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的荣誉授予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是由于他发展了经济理论和政治决策的契约与宪法的基础。这是布坎南毕生从事的研究项目，它使布坎南成为现在一般称作公共选择或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标准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价格系统范围内的市场上，家庭和企业如何相互作用。描述这种相互作用的一种方式，认为经济系统是由财产权利的大量自愿交换构成的，该系统——以几十亿的日常交易或交换——引人注目的特质，是以自发的方式发挥作用并协调的。作为家庭或企业成员的所有个人，主要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但是整个系统的结果通常是与总体利益相一致的。理解自动调节的市场机制——以及调节失败，诸如失业、通货膨胀或环境问题——业已成为自亚当·斯密时代起，经济学家努力的目标。

在这个新的研究领域里，布坎南作为创建者和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以各种不同方式拓宽了经济理论范围。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个贡献（可能在学术界之外最广为人知）是在政治制度、公共管理和组织利益的研究方面，扩展和利用了传统微观经济理论。把经济理论扩展到这些传统上由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其主要目的是创立一个说明政治制度的不同组成成分如何实际上起作用的连贯的实证的（或描述的）理论，而不是它们应该如何起作用的规范的理论。作为家庭或企业成员的每一个人，主要为他们自身利益而行动，并且寻求增加效用或利润，同时他们也是政治

系统的成员。很难相信，这些人会丢下自身利益而变成经济阉人，把他们自己完全投身于为总体利益服务的社会工程中。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向着包含现代混合经济所有重要组成成分的更一般的经济理论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它是一种从不同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组织成员的利益出发来推论其行为的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成就。

这种更一般的理论还引起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条件方面见解的变化。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二个贡献是使它更容易解释一些政治现象，如大量的预算赤字所产生的全部经济利益有利于现存的一代人（包括今天的选民和政治家），而大部分成本由目前没有决策投票权的未来几代人承担。业已成功地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具有良好组织的生产者是怎样在牺牲分散的和更缺少有效组织的消费者利益情况下，来得到益处的。由于左的或右的不同政治党派试图通过诱导中间投票人转向其中一方，以使他们自己获得大多数选票，中间投票人几乎通过数学的必然性来加强其自身的地位。研究这种拉力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通过政治或行政措施来校正不同的经济协调或“市场失败”，但这样做可能造成新的和同样严重的“政治失败”。

公共选择的第三个领域（布坎南在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涉及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基础。受克努特·维克塞尔著作的启发，布坎南在1949年就已经开始分析如何把公共支出和课税决策在全体一致原则的基础上来构建。两个人之间产生的自愿交换可以推广到没有任何人是损失者的社会契约中。这种国家的契约主义的见解于是就发展为宪法的经济理论，其中，当全体一致的需求下降时，理想的决策规则将根据权衡高的全体一致决策成本对比不同个人的损失来决定。

重要的问题是宪法契约和社会的规则系统的设计，在为保护

公民免受外部和内部威胁及不确定性所必需的强制与国家的强制力量有被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所滥用的危险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这一探索使布坎南深刻理解了规则和规范的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这种研究的进一步结果不仅把政治和经济决策结合起来，而且还包括了法律规则系统的重要部分的社会理论。

讲演词（布坎南演说）

经济政策的宪法^①

1. 导言

公共财政学应始终清楚地记住政治条件，不要期望从过去年代的以政治哲学为根据的租税学说中得到指导，而要力图打开进步与发展精神的秘密。（维克塞尔，第87页）^②

在此刻，如果我不承认那位伟大的瑞典人克努特·维克塞尔

① 我感谢罗伯特·托利森（Robert Tollison）、维克·范伯格（Viktor Vanberg）、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有益评论。

② 这里及随后的引证都出自克努特·维克塞尔的“公平课税的新原则”，包括在《财政学理论名著》内，由马斯格雷夫（musgrave）和皮科克（peacock）编辑（伦敦：麦克米伦，1958年）。这篇译文则采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内容更全的作品，《财政理论研究》〔耶拿：古斯塔夫·费希尔（Gustav Fischer），1896〕。

对我本人工作的影响，那我就太粗心了。没有他的影响，我就不能站在这个讲台上，我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财政理论方面的论文，可以说是维克塞尔论题的种种重述、推敲与扩展，这个讲演也不例外。

在我的生涯中最令人激动的显示智力的时刻之一，是1948年我发现了不为人知和没有翻译的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这篇论文埋在芝加哥古老的哈波图书馆布满灰尘的书库里。一位学术新手，在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从容地浏览了维克塞尔的文章。这样，我无意中获得了珍宝并有幸写出了自己的激动人心的学习心得。维克塞尔关于税收的新公平原则给我以巨大的鼓舞。维克塞尔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是一位被公认的有名人物，他向财政学理论的正统观念挑战，所涉及的方面与我本人发展的批判意识一脉相通。从在芝加哥的那个时刻起，我就决定要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维克塞尔的文章。于是，我立即着手翻译，花了一些时间，在最后出版前得到了伊丽莎白·哈德森(Elizabeth·Henderson)的大力帮助。

归根结底，维克塞尔的启迪是明白的、重要的和不言而喻的。经济学家们应该停止好像他们是被一位仁慈的君主所雇佣的那样提供政策建议，他们应该关注在其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用维克塞尔的理论武装起来，我也敢于向仍在公共财政学和福利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念挑战。在一篇绪言性的论文中，我请求我的经济学同仁在着手分析供选择的政策措施的效应之前，提出国家的、政治的某种模型假设。我敦促经济学家去注视“经济政策的宪法”，去检验政治人物在其中行动的约束、规则。像维克塞尔那样，我的目的最终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着手提出“良策”之前，我先试图寻找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意义。

维克塞尔理所当然的是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先驱代表，

因为我们在他 1896 年的论文里发现了提供这一理论基础的所有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均一的经济学以及作为交换的政治。我将在下面各节里讨论这些分析结构的要素。在第五节里，我把这些要素统合到一种经济政策理论之中，这种理论与西方自由社会传统上认可的原则相一致。它建立在这些原则上，并且系统地扩展了这些原则。然而，对制度——宪法改革的隐含目标，继维克塞尔做出创造性业绩以后，差不多在一个世纪内不断受到顽固抵抗。当然，个人对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中心论题，经济学家为阐明这种关系而作的任何努力都必须置于这个更全面的论说范围之内。

2.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如果效用对社会的每个成员是零，则对社会的总效用不可能不是零。（维克塞尔，第 77 页）

经济学家很少检验他所运用的模型的先决条件。经济学家一开始就简单地把个人看做评价、选择和行动的单位。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必需注意到选择和决策的环境，即个人必须从中做出选择的环境。不管产生结果的过程或制度结构多么复杂，经济学家总是考虑个人的选择。这种方法在应用于市场或私营部门的相互关系时，很少受到挑战。作为（法律上可交易的）货物与服务的买者和卖者的个人，被认为是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偏好（不管是怎样的偏好）进行选择的，因此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深入探究这些偏好的内容（个人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个人本身就是评价的源泉，而经济学家的任务，则是对这些未经检验的偏好最终转化成一个复杂的结果型式的过程提供一种可理解的解释。

在方便个人之间自愿交换的制度框架中，这个过程产生了可

以实在地评价的结果，这个 18 世纪的发现使“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科学应运而生。当“市场”被从功能上解释为存在某种以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时，市场过程的实在地评价结果与这些过程本身的制度特点之间的关系，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在独立于个人选择的过程之外来定义的。

既然对经济过程的解释，已微妙地转向这种目的论的解释，那么对政治或政府过程作类似的解释就不奇怪了。而且，对政治的目的论的解释，是许多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推力。因此在对评价问题的基本差异缺少研究时，对于“经济”和“政治”的解释好像是并不矛盾的。我们未能认识到：个人在市场上选择和行动的后果，在特定的约束下可以被判定为对他们是价值最大化的，而无需引进一个外部的评价准则。过程本身的性质保证了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不能把这种“价值最大化”观点从市场扩展到政治学中，因为后者不直接体现同前者结构相一致的对应。没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那种政治上的对应物。因此，对维克塞尔和其他欧洲大陆学者想要把经济理论推广到公营部门的运作的尝试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一种保持实质上个人主义的经济理论，无需陷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条条框框之中。如果最大化的实行，限于对做出选择的个人的解释和理解，而不予扩展到整个经济，那么，分析在不同制度下个人选择行为，并预测这些不同的环境将如何影响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毫无困难。在苹果和橘子之间做出选择的个人，仍然是在投票站选择“候选人甲”与“候选人乙”的同一个人。显然，不同的制度结构本身可能影响选择行为，许多现代公共选择理论都解释了这些关系。但我这里的观点是更为基本的，就是个人的选择行为同样地适用于分析所有选择环境。比较分析应预见到由

市场和由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产生的结果之间，在特性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从总体上说，这些预测以及得出这些预测所依据的分析，在规范性的内容中极为缺乏。

3. 均一的经济学

……不论是行政机构，还是立法机构，甚至立法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都是实体……都不像支配的理论所说的那样，它们并不是一心一意地要增进公共福利的单纯的社团机构。代议机构的成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一般福利的兴趣恰似他们的选民那样，既不多也不少。（维克塞尔，第 86 页，87 页）

如果对个人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不加以事先的规定，这种分析可能引出有限的、一组可能被证明无效的假设。然而，如果要预测有关约束的变动对选择行为的影响，则必须对这些自变量加以识别并标明符号。有了这一步，便可以提出更广泛的可能被证明无效的命题。例如，如果苹果和橘子都是实在的有价值的“财货”，那么，如果苹果的价格，相对于橘子的价格来说下降了，则人们会购买更多的苹果；如果收入是一种实在的有价值的“财货”，并且如果对收入来源 A 征税的边际税率相对于收入来源 B 增加了，则挣得收入的更多努力将转向来源 B；如果慈善赠予是一种实在的有价值的“财货”，并且可以减税，那么可以预测将会出现更多赠予物；如果货币租金是实在的有价值的，并且执政者随意的分配租金的权力增加，则希望保护这些租金的个人就会把资源更多地用在投资上，试图影响执政者的决策。请注意，对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加以识别并赋予正负号，就能在可运用性方面迈出相当大的步伐，即使对不同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不作任何预先的规定。为了在市场或政治相互关系方面得出一种完全可运作的选择行为的经济理论，没有必要把净财产或净收入作为行为的根

本性动因。

把个人合理行为模型扩展到政治领域时，一方面对自变量识别并赋予符号，另一方面对这些自变量加权，二者之间的差别值得进一步注意。“政治学的经济理论”的许多批评家，把他们的批评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一理论必须包括净财富最大化的假设，这是他们在许多情况下观察到被证明失效的一种假设。醉心于这种理论的人们有时会为批评家这样的误解提供依据。政治学的经济理论的解释力所涉及的最低限度的关键性假设仅仅是：可识别的经济自我利益（如净财富、收入、社会地位）对进行选择的个人来说是具有实在的价值的“财货”。这种假设没有把经济利益放在支配地位，并且它肯定不意味着归咎于从政的人怀有邪恶的目的。在这方面，这种理论与市场行为的标准经济理论的动机结构保持完全一致。从市场和政策相互作用得到的预测结果的差别，来源于这两种体制的结构差别，而不是来源于人们在扮演不同的体制角色时在动机方面的任何转变。

4. 作为交换的政治学

如果某人被迫为某一活动的费用捐赠款项，而该活动并不增进他的利益，或者甚至可能与他的利益针锋相对时，这就好像是一种极明显的不公正。（维克塞尔，第 89 页）

无论是市场行为还是政治行为，个人选择以及当他们做出选择时，可辨别经济利益是他们真正地赋予价值的“财货”之一。但是市场是交换的机构，个人进入市场是为了以一物交换另一物。他们并不是为了增进某一超交换或超个人主义的结果而进入市场。市场并不是在动机方面起作用。对于各个选择者一方来说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某种偏爱的总合的结果，某种全面的“配置”或“分配”将会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出现。